

軍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 还是“軍事社会主义”？

——論列宁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關於凱撒德國战時
經濟制度觀點的原則分歧

郭 吳 新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帝国主义交战国家都把本国经济转上了军事化的軌道。在经济军事化和进行掠夺战争的过程中，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现象，也普遍地急剧加强起来了。当时，按经济组织战争化的水平和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规模而言，凱撒德国均名列前茅，它成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标本。

在战时德国的经济方面，究竟出现了那些重要变化和新的现象呢？凱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又应该怎样说明呢？关于这一类的问题，不仅受过人们的普遍关心，而且还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原则性的争论。

列宁认为，战时德国经济中的变化，仅仅标志着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凱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仍然是资本帝国主

义。相反地，第二国际的德国修正主义分子则认为，德国战时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走向社会主义”，大战时期，凱撒德国的经济制度甚至已经是“军事社会主义”了。十分明显，列宁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是针锋相对的。到底那一种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呢？

这次原则性的争论，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们认为，今天仔细地重温一下这个争论是大有裨益的。通过温习，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一步体会列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以及较具体地了解凱撒德国战时经济制度的实况；而且，温故可以知新，通过温习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某些反面教材，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有关现实问题上，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

(二)

凱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究竟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呢，还是“军事社会主义”呢？在详细论述两种对立的观点之前，首先应该弄清历史的实际情况。

历史告诉我们，凱撒德国的经济在战时

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在所有的变化和新现象中，概括地说，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经济军事化的需要，凱撒德国的军费支出在战时惊人地扩大了，同时，

军事工业生产也相应地得到了片面发展。

大战以前,在扩军备战方面,帝国主义德国本已是臭名远扬的急先锋,不过相对于战时说来,德国战前的军费支出还是比较不大的。例如,直到1913年,德国的年度军费支出还不过21亿马克(按1914年价格计算),即仅占到当年国家预算支出的5.7%和国民收入的0.4%。

大战期间,以军费支出为中心内容的德国国家预算支出,有了急剧的增加。据计算,大战时期德国的全部直接军费支出约为800亿马克(按1914年的价格)。它大约相当于德国战时整个国家预算支出的五分之四和国民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

为了搜罗庞大的战费,德国统治阶级的主要法宝是大举增发国内公债。1914年9月至1918年9月,德国政府先后发行了9次内债,总额高达625亿马克(按1914年的价格)。在所有交战国中,德国是发行内债最频繁的国家。除增发国债外,扩大国家税收收入、掠夺占领地区和乞灵于钞票印刷机,也是德国政府解决战时财政困难的重要办法。

以庞大的军事支出为基础,同时依靠牺牲民用工业部门,使得军火武器的生产迅速扩大起来了。例如,战时各种大砲的砲身产量提高了5倍(1915—1917),各种砲弹的月产量提高了10倍(1914年10月—1918年秋);而机枪的月平均产量竟提高了69倍(1914—1917年秋)。军费的激增和军火武器生产的空前扩大,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军事化,这是凯撒德国战时经济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变化。

第二,国家建立了“调节经济生活”的中央领导机关,对战时经济的一系列部门和领域,实行了“有计划的”干预和管制。

1914年8月9日,德国政府在普鲁士陆

军部下面设立“战时原料处”,它是战时前两年中的主要中央经济调节机关,下辖有一系列的专业机构。1916年冬,为了配合加强战争动员的“兴修堡垒纲领”的执行,“战时原料处”被扩大改组成“战时管理局”,改隶于帝国国防部,进一步扩大了调节全国经济生活的权力。同时,为了配合“战时原料处”——“战时管理局”,战争爆发后,还在合并原有的资本家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各工业部门拥有分支机构,即部门战时委员会,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分配国家的军事订货,并促进军事订货的交货。

工业生产是战时经济调节的首要对象。为了片面扩大军需品的生产,容克资产阶级政府推行了强制缩减民用工业品生产的反动政策。大战时期,它一方面迫使7,500个以上的生产民用商品的大、中型企业,转而生产军需品;另一方面,它又对广大的小型轻工业企业和手工企业,以“非重要企业”为口实,从各方面加以限制,实际上使这些小企业无法生存或濒于破产。结果,到1917年底,共约10,000家小企业被迫关门,它们的设备和劳动力,也大多被强制转入了所谓“重要企业”、即军需企业里去了。

从保证军需生产出发,德国政府在战时强力干预了原料的供应事务。德国素来是工业原料自给程度比较低的国家,绝大部分重要原料平时靠进口解决。大战开始后,由于一系列传统的原料进口国家变成了交战对手,再加上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战略原料的补给困难空前严重起来了。针对这种情况,容克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主要是:登记并封存已有的原料储备,把原料优先供应军需工业部门,特别是垄断资本企业,同时大量削减对民用工业企业的原料供应;扩大自欧洲中立国的原料进口量,并通过这些国家套购协约国的原料和燃料;

加强对各被占领国原料资源的掠夺；扩大国内原料生产，发展合成氮、人造橡胶等新工业部门，加强使用代用原料；同时在德国居民中强制征集废金属和金属制品（傢俱、炉盖、食具、门窗把手之类），以供回炉之用，等等。尽管如此，原料缺乏的困难仍与日俱增。

同调节原料供应相联系，战争期间，德国政府对进出口贸易也实行了管制。为此，新设立了中央购买公司，它在许多中立国内拥有分支机构，主要任务是扩大战略原料及粮食的输入。到1916年底止，该公司通过扣用私人企业进口商品的办法来控制输入；1917年年初起，它进一步把对外贸易业务全部直接掌握到自己手中，严禁私人企业直接经营进出口贸易。虽然德国政府采取了这些办法，但并未能阻止战时对外贸易状况的恶化，也未能根本缓和原料和粮食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

战时，德国政府还对物价实行了管制。一方面，从满足垄断组织攫取暴利的贪慾出发，德国政府故意抬高军火及重工业品的官价，使高垄断价格合法化。例如，一吨马丁钢的实际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只有180马克，但政府却据钢铁大王的意志，把每吨马丁钢的官价定为280马克，结果，仅此一项，就使得钢铁巨头在战时多赚了几亿马克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同限制人民消费和冻结工资政策相联系，从1914年10月起，德国政府对大众消费品实行“固定价格”政策，这些消费品的价格一律由政府规定，每两周才能调整一次。

此外，在人民消费、劳动力分配等方面，德国国家在战时也实行了强制性的调节。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结合有关情况另行论述。总之，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各种战时调节措施，几乎全是德国统治阶级为应付战争、为应付由战争所导致的严重

困难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被战争和经济破坏逼出来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套办法。

第三，在农业、轻工业和煤产量等大幅度下降的条件下，容克资产阶级国家在战时实行了大众必需消费品的凭证配售制度，系统地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战时，由于青壮劳动者大批抽走，加上容克阶级故意缩减播种面积以抬高农产品价格，德国的粮食产量大大缩减。同时，进口粮食（战前平均占全国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也急剧减少，粮荒情况空前突出起来了。进口棉花的受阻，更直接影响了轻工业的重要部门——棉纺工业的正常开工。此外，成批的熟练劳动力和运输工具外调的结果，也引起煤产量的显著下降。面对着这类日益增长的困难，德国政府迅即走上了对大众消费品（食品、衣物、燃料等）的凭证配售道路，力图把战时的困难转嫁到广大劳动者身上。

1915年2月，麵包配给证在柏林问世（当时每人每日麵包定额为225克），揭开了战时配售制的序幕。1916年起，配售制扩大到牛油、脂肪、肉类及肉制品、马铃薯、衣服、燃料等消费品上面。不仅在柏林，全国各城市和工业区的数千万居民，也同样被罩上了配售制的罗网。同时，德国政府在农村实行征集制，强迫广大农民把所谓“多余”农产品（按1915年1月法令，农民每人每月仅能自留口粮9公斤）义务交售给国家。为了从事征购和定量分配事务，在中央经济调节机构下面，德国政府陆续建立了一大批的专门组织。仅仅在食品方面，这类专门组织即有20个左右。

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大众消费品的配售量系统地下降了。到战争后期，下降的情形尤其惊人。以食品为例，1918年下半年的配售指数（战前消费量为100）如下：

马铃薯	94	蛋类	13
白糖	82	肉类及肉制品	12
麵粉及小麦	48	豆类	7
牛油	28	脂肪	7
植物油	17	魚	5
乾酪	15	大米	4*

* 1916年7月至1917年6月。

在消费数量剧减的同时，战时食品的质量也每况愈下了。例如，战时配售的麵粉中掺有多量的杂粮和麸皮，肉类一律去油并夹带骨头，一大部分牛油实际是低质的人造油，糖精代替了白糖，树果加工品顶替了真咖啡，等等。

衣物的配售情况更加糟糕。一则配售量极少，再则衣物质量大大恶化。战时的纺织原料中，相当一部分是烂布和旧被服加工得到的复制毛和人工木棉。各种杂皮也取代了惯用的牛皮，变成了重要的制革原料。由桉树纤维织成的“纸布”衣物流行一时，甚至靴鞋的底也是用纸造成的。

战时消费品配给制的实际状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强加给劳动者的配售制度，对于统治阶级分子（资本家、容克、官吏之流），事实上是全无约束力的。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门路，包括高价手段，照旧得到所需要的一切。

第四，国家一方面强制推行所谓“普遍义务劳动制”，对劳动力的分配和转移进行严格管制；同时，与此相联系，还横暴地剥夺劳动者的一切起码的政治经济权利。

大战期间，1400万成年男子（占全国男性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被强制征入侵略军队，这引起了德国经济中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劳动力的极度缺乏。针对这种情况，德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日、驱使大批家庭妇女、老年人及半成年人作工、役使战俘以

及从前线抽调部分熟练劳动力等办法，企图缓和劳动力供应上的紧张状态，据统计，在拥有10名以上工人的各企业中，战时男工共减少了130万人，而女工却增多了70万人以上。另一方面，从优先以劳动力保证军需工业出发，德国政府又剥夺了劳动者的转业和就业自由。早在1915年1月，凯撒政府即颁布命令，禁止军事工业工人转移企业。1916年末，按“兴登堡纲领”的总动员要求，德国政府进一步发布了臭名昭著的“祖国辅助服役法”。这个反动法令规定：全国年在17—60岁之间的男子，均须义务服役；服役性质和地点，全由国家决定；国家并有权强制劳动者从一企业转入另一企业；所有工人，均禁止罢工。如考虑到战时德国政府还三令五申地取缔劳动者的反战活动，并以徒刑及死刑相威胁的话，那么可以说，随着“祖国辅助服役法”的推行，凯撒德国完全实现了劳动的军事化。

在国家强制调节措施的促进下，战时德国各部门间劳动力的分配，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批劳动力从同军需关系较少的部门，被强制转入了所谓“为国防服务”的部门。例如，1913—1917年间，德国各工业部门工人人数增加(+)或减少(-)的百分数如下：

化学工业	+85	食品工业	-22
机器制造业	+58	钢铁工业	-32
冶金工业	+13	木工业	-37
金属加工业	+12	纺织工业	-47
矿山工业	-7	磚石工业	-72

按绝对数说来，所谓“为国防服务”的工人人数，1915年在德国已经有150万人。1917年，这类工人总数更升至350万人，即几乎占到当时全国大工业工人人数（600万人）的五分之三。一切为了侵略战争，这就是容克资产阶级式的劳动力调节的全部意

图。

第五，按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德国国家在战时大力推行强制卡特尔——新迪加化的反动政策。

战前，德国政府已搞过强制卡特尔化的活动。大战的第二年，即1915年9月，鉴于莱茵——威斯特伐伦煤业新迪加旧协议行将满期并有瓦解之虞，德国政府匆忙地颁布专门法令，强制这个新迪加维持活动。以后，这一法令的效力被扩大到其他一系列工业部门，如冶金、化学、造船、水泥、制鞋、制革、食品及烟草工业等等部门，各邦当局则同时得到了强迫任何企业加入垄断组织的权力。结果，在德国出现了远非战前所可比拟的强制卡特尔——新迪加化的热潮。

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德国垄断组织的数目和规模比战前有了显著扩大。例如，在战争爆发前三年，即1911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共为550—600个；经过战时的大发展及战后初期的继续增加，到1922年，这类卡特尔的数目已上升到1,000个，即增多了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强。

第六，德国政府在战时进一步扩大了国家所有制，一则为了直接增加军火生产，再则在于优先满足私人垄断组织对原料和动力

的需求。

在战争的刺激下，1913—1918年，德国国家军火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了，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总数，竟由原有的43,000人增加到200,000人，即提高了3.6倍以上。同时，国家还以预算中拨出大批款项，兴建了一批生产合成氨、精铅及电力的国有企业，扩大了原有国家电站的生产能力，并收购了部分私人电力公司的股票。德国政府企图通过这些方式，尽可能更多地供给私人军火及重工业垄断组织以廉价的动力和部分重要原料，既使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避免投资风险，又可帮助它们获得高额利润。

此外，德国政府还同私人垄断组织一起，设立了几十个官私合营的战时军需品股份公司，如五金股份公司、化学品股份公司、铅业股份公司等。这类股份公司统辖于“战时原料处”——“战时管理局”，主要业务是经营有关工业原料的分配和销售，原则仍然是：优先保证军火大王和重工业巨头的需要。

以上各点，我们认为，就是凯撒德国战时经济制度中出现过的主要变化和新的现象。

(三)

现在，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是：战时经济制度方面的上述各种变化，究竟给凯撒德国的国民经济和阶级关系，带来了那些后果或影响呢？我们认为，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经济的深刻的、全面的图景。

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极度加强，是战争经济制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经济军事化的结果，在军需工业生产扩大的同时，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却相反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减缩。1913—1918年，德国纯粹军事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上升了10%；但是，半民用半军用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却下降了37%，而完全民用性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数竟惨落了59%！

农业进一步落后于工业了。战时工业生产总指数共下降43%；但是，由于千百万青壮农民被强征入伍，以及容克资产阶级国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军火生产等等原因，农业总产量在战争后期竟减少了一半。

帝国主义战争给德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大战爆发后，德国三分之二的商船（共计300万吨）被协约国和其他国家扣留起来，引起了海上运输工具的奇缺；德国传统的贸易国家，或者变成了交战对手，或者由于协约国的海上封锁而被隔断，使大量贸易无法继续进行；再加上德国政府禁止一系列商品的出口和进口，这种种因素，共同导致了对外贸易状况的惊人恶化。和战前相比，1918年德国的进口及出口总值分别减少了五分之三和四分之三。同工农业相比较，对外贸易显然下降更多，这是德国战时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侧面。

以上材料同时也表明了，战争经济制度引起了德国经济的大倒退和深刻破坏，这是另一个突出的后果。整个说来，到战争末期，德国的工农业生产，已分别退回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水平。同时，帝国主义战争还使德国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在以军费为主体的国家支出的名义下，被白白地“抛到水里”了。不仅如此，在战争条件下，德国的工业固定资本还受到剧烈磨损而得不到应有的更新，结果，作为德国经济主导部门的工业，其基础也空前削弱了。并且，超过千万人的青壮劳动力被强征入侵略军队，脱离了生产领域，自然大大减少了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手；而数百万人的死亡和伤残，更使德国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同这一切情况相联系，经过战争，德国国民财富共减少了三分之一，可以说，这是战时德国经济倒退和物质财富破坏的总结性证明。

经济混乱是经济倒退和破坏的孪生兄弟。德国战时经济的混乱，又是同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干预及调节分不开的。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列举这方面的情况，只准备概略地谈谈一些较突出的事实。例如，在

国家厉行消费品配售制的同时，1916年在柏林就发生了大规模伪造面包证的事件，各大城市中人们“象野兽一样地抢夺一块面包”，甚至弄得从傍晚起就没有人敢单独外出；至于黑市交易，更随着经济恶化而越来越猖獗了。又例如，一方面是政府对原料供应及消费和物价的全面管制，另一方面是垄断组织囤积、浪费贵重原料，并不断抬高商品价格。再例如，当凯撒政府力图扩大农业耕地面积和从农村多征收“余粮”以缓和粮食供应困难的时候，容克地主阶级却从抬高农产品价格以攫取暴利出发，尽量缩减播种面积及产量，而广大农户则对政府粮食机关隐瞒自己的真正产量（仅马铃薯一项，据估计，即有五分之二的“剩余数”未据实上报），以逃避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劫掠。还例如，同国家掌握的财富逐年增多、私人和国家垄断组织空前发展、“30,000个”上层统治人物的财势不断扩大等等相对立；国家财政却每况愈下，中小企业一批又一批地破产倒闭，广大劳动者的贫困处境更远远甚于战前。至若各垄断资本集团争夺原料和军事订货的激烈斗争，金融寡头们在掌握战时经济调节机构领导权力方面的肉搏倾轧，更充满了战时德国的全部历史。1915年钢铁大王斯丁纳赶走电气巨头拉铁诺，从而控制“战时原料处”的全武行，不过是这种争权史中的一个著名的插曲。

总之，无可否认，战争经济制度对凯撒德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和后果不是别的，而恰恰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急剧加强，是经济的大倒退和惨重破坏，是空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那么，不禁要问，造成德国经济大大恶化的战时经济制度，又给当时的各个阶级带来了那些具体的后果呢？阶级之间的鸿沟又变得怎样了呢？

先谈谈垄断资产阶级。历史告诉我们，

凯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对这个阶级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战时新设的权力极大的中央经济调节机构，无例外地直接掌握在垄断巨头手中。例如，总电气公司的头子拉铁诺，就是“战时原料处”的首屈主脑。继他之后，钢铁大王斯丁纳，一直控制着“战时原料处”——“战时管理局”。至于“中央工业委员会”及其广布的分支机关，则更是由清一色的大资本家组成的。这样一来，德国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的结合空前密切了，垄断资本取得了制订和执行国家战时经济政策的直接大权，并显著地加强了自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同进一步控制和利用国家机器相联系，另一方面，战争经济制度还给德国垄断资本带来了异常丰厚的、更有保障的利润。接受国家军事订货和购买国债、特别是前者，是垄断资本攫取战争利润的最主要的途径。据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自供，他们仅到1918年4月即共获得了100亿金马克的利润，实际上当远远超过此数。最大垄断资本集团获得的利润最多。例如，军火康采恩克虏伯公司的战时利润最少有8亿马克，这意味着，四年战争期间，克虏伯公司赚了相当于战前二十年和平时期中所赚到的利润总数。斯丁纳所属的各企业，在战争中则得到了9亿马克的巨利。结果，这些垄断组织的财产急剧膨胀了。经过战争，克虏伯公司的财产增加了3倍，斯丁纳所支配的财富则增加了9倍。由于神话般地大发战争财，到大战结束时，斯丁纳已拥有10亿马克的资财，可以说，他差不多变成了当时德国的头等富豪。

帝国主义战争也给容克地主带来了不少好处。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下，他们得到了成批的极低廉的劳动力（其中包括大量战俘），得到了不少新的农业机器、运输工具和其他设备。他们还与垄断资产阶级一起，掠夺占领地区人民和哄抬农产品价格而牟取

暴利。

整个说来，在战时的德国，由于血腥的军事利润的喂养，百万富翁的总人数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说，新兴的百万富翁至少有10,000人之多。凯撒德国的这些上层分子，即以垄断资本家为首的几万个新旧富豪们，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帝国主义战争简直是他们的极乐世界。战时的强制义务劳动和消费品配给制之类的国家调节措施，实际上同他们毫不相干。相反，他们在战争经济制度下，却照旧华衣饱食和安然自得，甚至还变得更加有钱有势，更加荒淫糜烂了。

同统治阶级的境况相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及国家的战时经济调节，却把劳动者打入了更加阴暗的地狱，使他们遭受到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大牺牲和痛苦。

首先，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破坏夺去了以百万计的劳动者的生命，并使大批德国劳动人民成为残废。据统计，战时在前线战毙的德国人多达180万，失踪者80万，负伤和残废的共计420万，另外，在德国后方因饥饿和流行病死去的还有90万人以上。这是德帝国主义对本国人民欠下的巨大血债。

其次，德国广大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在战争经济制度下，也史无前例地恶化了。大战伊始，根据政府的命令，德国资本家即广泛实行加班加点，取消假日，并强迫工人进行夜间劳动。战前适用于女工和青工的若干保护规定，也被全部取消。在与军事供应多少有关的企业中，工作日一般长达12—14小时，即比战前延长了30—40%。劳动强度也提高了，劳动保护事实上根本没有，结果，生产中的不幸事故一年多于一年。

在战争重担的压迫下，德国劳动人民的生活也陷入了异常困苦的境地。如前所述，在国家“征收余粮”的搜括下，劳动农民只

剩下了可怜的口粮。至于广大工人阶级，在政府力图冻结工资的反动政策和物价飞涨之下，他们的实际工资在战时系统地、大大地减少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份	名义工资指数	生活费用指数	实际工资指数
1900	100	100	100
1913	132	130	102**
1914	125*	134	96
1915	147	168	87
1916	172	221	78
1917	230	329	70
1918	292	407	72

* 1914年9月。 ** 引者换算所得的数字。

以上的材料表明，即使按官方公布的压低了的生活费用指数计算，德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在战争后期也下降了30%！

战争期间，德国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也空前恶化了。消费品尤其是食品配售定额的不断降低，更给广大的工人群众和城市普通居民，制造了说不清的灾难。根据某些作者的计算，战前德国每一成年人平均每日从食品中所摄取的热量为3642卡路里；战时，相应于食品配售量的下降及食品质量的恶化，普通居民每日从配售食品中所能得到的热量系统减少了，具体数字如后(单位：卡路里)：1915年—2800，1916年夏—1983，1916年冬—1344，1917年—1312。可见，从1916年冬季起，德国劳动者每人每日，只能得到为恢复正常劳动力所必需的热量的1/3左右。

最后，战时制度还横暴地剥夺了德国劳动阶级的一切最起码的经济政治权利。德国统治阶级不仅禁止劳动者自由转移企业，把他们象农奴一样固定在各种苦役岗位上；而且，容克资产阶级还在各企业中和全国范围内，实行兵营式的制度，取消了劳动人民的言论、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任何

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人，都会被戴上“国事犯”的帽子，从而受到徒刑甚至死刑的威胁。这些事实说明，在战时德国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是充满了多少的血泪和痛苦啊！阶级鸿沟的这种扩大，劳动者牺牲和困苦的如此加深，又怎能不在战时德国引起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化呢？！

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深刻化，终于导致了德国战时阶级斗争的极度激化。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如统治阶级扩大了军事警察机构的残酷镇压，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叛徒领导集团所进行的无数欺骗及破坏活动，德国劳动人民在全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1915年以后，仍以前仆后继、愈战愈勇的气概，用怠工罢工、散发宣传品、示威游行直到武装起义等方式，积极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及其组织者——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阶级的正义斗争。

德国工人阶级一贯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据统计，战时德国的罢工斗争情况如下：

年份	罢工次数	参加罢工人 数(万人)
1913	2464	31.1
1914	1115	6.1
1915	137	4.7
1916	240	42.2
1917	561	146.7
1918	531	250.0

表中的材料说明：尽管战争最初两年，罢工斗争曾经一度受到压抑；但从1916年起，罢工斗争的烈火又重新熾燃起来，特别在战争的最后两年，罢工运动的规模更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空前纪录。

俄国的革命、尤其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地鼓舞了德国工人阶级，促进了德国罢工运动和反战斗争的蓬勃发展。

1917年春天，在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柏林、莱比锡、哈勒、布劳恩施外格及马格德堡等地军火工人，举行了四月大罢工，强烈地提出改善经济状况和缔结不强迫他国割地赔款的和约等经济政治要求。1918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发下，德国的罢工斗争和反战行动更是风起云涌。该年一月末，从首都柏林开始，以军火工人为主体的广大工人，掀起了战时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战政治罢工，罢工迅速席卷了全国所有大中工业城市，参加斗争的工人超过了100万人，在柏林甚至发生了同军警的武装冲突。同年秋天起，罢工斗争和反战示威游行再次勃起，并最后发展成为有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的革命，即著名的11月革命，结束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同

盟，是战时罢工和反战斗争的有力鼓动者。为响应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伟大号召，早在1915年，李卜克内西即提出了“主要的敌人——在国内”的战斗口号，大大地提高了德国劳动者的觉悟，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和左派相反，窃居社会民主党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则同容克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不仅尽力破坏各次罢工和反战斗争，而且帮助垄断资产阶级篡夺了11月革命的果实，使这次革命遭到失败。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是，阶级斗争一浪高于一浪的事实本身，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战时德国的阶级矛盾曾经达到了多么深刻和尖锐的地步。

以上种种事实，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战时经济制度，对德国国民经济和阶级关系所带来的主要影响。

(四)

在从各方面探讨了战时德国经济的变化以后，现在，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更具体地说明列宁和第二国际德国修正主义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温习一次列宁的观点。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经济问题，始终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早在1916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结合对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就阐述过战前德国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的“个人联合”情况，并揭示了德国国家垄断的实质、地位及作用。这些论断，我们认为，正是以后列宁分析战时德国经济制度的出发点。

列宁对德国战争经济的看法和论断，主要包括在从1916年底起的一系列著作中。同时，在这些著作及其他文章中，列宁还系统

地探讨了各交战国经济的一般特点，探讨了德国以外某些交战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在这类分析中，有不少的论断完全适用于当时的凯撒德国，因为在德国的战时经济内部，同样地存在着那些现象。

从上述各种著作出发，在分析德国战时经济中的重大变化和整个德国战时经济制度方面，根据我们的认识，列宁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主要有以下十点：

第一，列宁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交战国的经济“已经不是‘纯’资本主义了，……而是国民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①在这里，列宁指出，决定各交战国经济特殊性的直接原因是：首先，和纯资本主义、即为不可知的自由市场工作的商品生产不同，战时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52页。

各国绝大多数工商企业“是按照国家订货甚至往往是为了得到国家贷款而‘工作’的”。^①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说来，不仅可以用国家贷款来扩充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是，销售商品的市坊已经是可知的、有保证的了。其次，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再是为平时的需要服务，而是为特别的需要，即“为国库、为战争服务”了。换句话说，这种经济中大量生产的商品的内容和用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经济已经是“直接或间接地同供应军需品有关的经济”。^②最后，同以上两点密切联系，这种经济给垄断组织制造了靠盗窃国库发财的大好机会，这种经济正就“是有系统的、取得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的行为”。^③

第二，列宁指出，在战时的德国，为了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的需要，国家对全部经济生活，实行了由“中央机构”进行的“指导”和“调节”。^④

更具体地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是：首先，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战时“实行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或任何人臆想的产物，而是“由于情势所迫”必然产生的现象。^⑤其次，战时德国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直接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动员人民的力量去进行掠夺性的战争”。^⑥再次，这种国家调节在战时德国是由“中央机构来指导”的，而这个中央机构又只“代表好几百个财政巨头或贵族君主之流利益”。^⑦再次，德国的国家调节涉及到全国“6600万人民的全部经济生活”，它是“在代表少数财政大王利益的一小撮容克贵族的领导下做到”的，是“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进行的，这里根本不存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富人”的可能性。^⑧最后，因此，战时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是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

堂”，^⑨事情就只能是这样。

第三，列宁断言，在战时饥荒的威胁下，凯撒德国实行的“调节消费的办法”，实际上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有组织地挨饿，但却丝毫不侵犯富人们的奢侈生活，这完全是“官僚主义和反动政策”。^⑩

列宁对这种情况深为愤慨，他曾经结合对这类“调节消费办法”产生的条件及其内容的论述，尖锐地揭露过这一措施的反动实质。列宁认为：首先，正象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国家调节一样，德国政府对消费的调节，也是在“战争迫使”下“实行的办法”。更具体一些说，是在德国“由于战争而遭受极其严重的真正的饥荒”的条件下，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的“调节饥荒”的措施。^⑪其次，在这方面，德国由于运用了“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最可行的经济组织方法”，因而成为了“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典型国家”。^⑫再次，在这个“调节消费的典型国家”里，“规定最高消费定额的远不是一切东西”，而只是广大人民的生活绝对必需品，如“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面包配给制是…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5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3、276页。

⑤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3页。

⑥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3页。

⑦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3页。

⑧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3、276页；第25卷，第323、336—337页。

⑨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页。

⑩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6—337页。

⑪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6页；第27卷，第395页。

⑫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6页；第27卷，第395页。

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德国劳动群众中搞得很兇的这类措施，不过为了“最有组织”地“安排”飢荒，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同意人们所说的：当时“德国是有组织的飢荒的中心”。①再次，和穷人相反，德国的“富人经常是不受任何消费‘定额’的限制的”。因为，“国家调节消费”也者，是“并不想监督富人”的，调节不仅“毫不涉及”富人用的“奢侈品”，同时，还讓富人用各种办法、包括“到疗养地”的办法，得到所需要的一切。②最后，因此列宁说，德国政府“并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拆穿说来，不过是用“反动官僚办法”，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忍飢挨餓”，另一方面则“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③

第四，列宁认为，凱撒德国的统治阶级，从调节战时生产出发所推行的“普遍义务劳动制”，是加强奴役广大劳动者的措施。具体说来，列宁的意见是：首先，德国的所谓“普遍义务劳动制”，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的，是由“容克（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的，④因此，这个制度不是针对这些统治阶级的，故虽有“普遍”之名，但决无普遍之实。其次，真正被强迫进行“义务劳动”的，是德国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而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或成为军事奴隶”。⑤再次，对于德国统治阶级的国家而言，“普遍劳动义务制”是“按照一定的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步骤”，是“对全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的一个“重大措施”，是国家“整顿财政”的办法，也就是用“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而“把战争重担推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身上”的一种手段。⑥最后，联系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列宁指出，作为资本帝国主

义“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的这一制度，它“是在最新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个前进的步骤”。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旦由工人”利用这种制度“来对付资本家和一般富人”，那么，这种制度就可以同粮食垄断、麵包配给制一样，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实行统计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⑦

第五，列宁指出，德国战时大力推行的强制新迪加化和发展国家所有制的政策，其结果是促进资本主义垄断化的加强，密切了垄断资本同国家政权的结合，并增加了垄断组织攫取战争利润的机会。

在这里，首先，列宁认为，所谓“强迫实行新迪加化”，其实质是“强迫在国家监督下实行联合”，这类措施不仅“丝毫没有直接…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而且还是人为地即“国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这种办法的结果是“使联合组织的数目增加，式样增多，意义增大”，⑧即推动了资本主义垄断化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列宁早已指出，从加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方面看来，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国家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6頁；第27卷，第399頁。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6—337頁。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7頁。

④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0頁；第26卷，第90頁。

⑤ 《列宁全集》第26卷，第90頁；第25卷，第344頁。

⑥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4、349頁；第27卷，第360頁。

⑦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頁；第26卷，第90頁。

⑧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3頁；第26卷，第89頁。

化是“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为一个机构”；^①另一方面，从国家垄断这种垄断形式对私人垄断寡头所具有的作用和从私人垄断同国家垄断的相互关系看来，国家垄断制的发展，对私人垄断组织是有利而无害的，国家垄断实际上只是容克资产阶级国家为财政寡头服务的一种方式。因为，“财政资本时代的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只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②最后，在指明促进垄断化和国家垄断各类措施的阶级社会后果时，列宁又说道：“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③

第六，作为对上述分析的总结，列宁着重指出：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个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主义在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战时的凯撒德国，业已出现了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④而且，在向（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方面，凯撒德国又是一个典型国家。

列宁非常重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问题，他清楚地指明了促进这种转变过程的客观条件，同时深刻地揭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真实内容。列宁认为，促进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主要条件是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同战争相联系的经济破坏。他写道：“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⑤他还写道：“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⑥关于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异常引人注

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列宁则明确地说道：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同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⑦列宁的这个论断，既是原来的提法的再一次强调，而且还对原来的提法赋与了更加普遍的意义。在这不久以前，正如前面引述过的，列宁曾经针对德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问题，指明它是“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巨大力量联合为一个机构”，^⑧现在，这种“联合（溶合）”已经不仅是德国集团的特点，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共有的内容了。

不仅如此，列宁在说明第一次大战时期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还明确指出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据我们的理解，列宁所强调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的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⑨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它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军事化条件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时的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全部措施，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经济上看，它是同为军事需要服务的特殊形式的国民经济相关连的；从政治上看，它是与保证垄断组织发战争财及屠杀众多人民的“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⑩相联系的；而它的阶级实质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4页；第25卷，第347页。

⑤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1页。

⑥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页。

⑦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1页。

⑧ 《列宁全集》第24卷，第372页。

⑨ 《列宁全集》第26卷，第90页。

⑩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9页。

和后果，“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①

同时，对于凯撒德国战时（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水平和典型性质，列宁也有过明确的结论。例如，在比较德、美两国情况的时候，列宁讲过：“…德国…在财政资本主义的组织性方面，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高于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②

第七，列宁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和战时经济制度，在凯撒德国不仅没有加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相反地，倒导致了巨大的破产和惊人的混乱。“战争开始时，社会主义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曾吹嘘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无情地嘲笑这种看法的同时，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经济制度，只引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大破坏”。③具体而言，战争和战时经济制度，带给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交战国的悲惨后果是：“…使生产力消耗殆尽。破坏和贫困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遭受极其严重的真正的饥荒”等等。④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混乱状况空前加强了。一方面是由资本家

“‘有计划地’攫取利润”所引起的“无政府状态”；⑤另一方面，也是在德国表现得最突出的，是饥饿的人群到处“象野兽似地争夺一片面包”。⑥作为这些分析的总结，列宁认为，大战后期凯撒德国的社会经济画面是：国家已“彻底破产”，局面则“混乱不堪”，而在饥荒的严重威胁下，帝国主义德国“正在趋于灭亡。”⑦

第八，列宁根据大量事实，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凯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即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集团大发战争横财的制度，也是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牺牲的制度。

按照列宁的意见，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确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因为，

对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说来，国家军事订货和贷款，使他们能有系统地、取得法律保障地“盗窃国库”；而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和饥饿”，又是他们“大发横财的最好条件”；并且，他们还可以依靠侵略军刺刀的保护，“掠夺”广大占领区，如“波兰、爱尔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地，等等。⑧唯其如此，列宁才一针见血地说：在德国战争经济制度下，“每天都使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使“大发战争财的新兴百万富翁”“迅速增加”，使所有“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0倍”，⑨也就是说，这种制度是“保证（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的制度，是“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的制度。⑩

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德国劳动人民“军事苦役营”或“军事苦工监狱”。⑪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剥削统治阶级“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而“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9—14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95页。

⑤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74页；第25卷，第43页。

⑥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0页。

⑦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页；第27卷，第431页；第32卷，第107页。

⑧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31页；第27卷，第399页；第28卷，第34页。

⑨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0页；第27卷，第399页；第28卷，第34页。

⑩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347页。

⑪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4，371页。

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这就使得“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受到巨大困难”；①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劳动者不得不背上沉重的“战争重担”，不得被迫“服军事苦役或成为军事奴隶”，国家还在生活上把他们“勒紧”，紧到挨饿的地步”，并且，他们当中的“千百万人”还须为统治阶级“30,000个上层分子”的利益“而葬身战壕”！②这一切说明，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是使广大德国劳动人民“担负极大牺牲的”制度。③

总之，在魏玛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谁是富人，谁就更富，谁是穷人，谁就被资本主义压得实在喘不过气来。……贫苦的人民流血牺牲，而他们得到的报酬只是饥饿、失业和勒得更紧的绞索”。④列宁的结论就是这样。

第九，依据以上论述的种种特点，列宁得出结论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一方面，这已经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上，

“一般垄断已经发展为国家垄断”，“……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代替了自由竞争……”⑤

另一方面，这个新阶段仍然“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资本主义”。⑥因为，以战时的德国为例，当时的国家照旧是“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全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当权的还是那“30,000个上层分子”，而中央经济调节机构也只是“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这样的国家及其中央调节机关所实行的战时经济调节，显然是为了保证“资本家……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和维护使劳动者处于“奴隶地位”的制度的。⑦既然一切是这样，那

么，除了得出上述新阶段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结论以外，又那能有什么别的结论呢！

第十，联系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列宁最后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完备的物质准备”，它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只要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主义国家，那在魏玛德国“就会得到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全部条件”。⑧

按照列宁的分析，在战时的德国，特别是到了战争末期的德国，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半”的“物质条件”，即“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具体说来，这些条件主要是：德国有了当时“最新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有了由容克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即全国性的“有计划的组织”；以及由于战争和对工人阶级压迫加重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并因而出现的日趋成熟的革命危机，等等。⑨这一切条件，使得当时魏玛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变成为“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1、397页；第29卷，第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7页；第25卷，第324、3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1页；第26卷，第365页；第29卷，第98页。

⑥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0页。

⑦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7页；第24卷，第274页；第32卷，第324页。

⑧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第32卷，第324页。

⑨ 《列宁全集》第29卷，第98页；第32卷，第324—325页。

没有任何中间级”了。^①

但是，在论述上述条件的同时，列宁却又特别强调指明：对于真正实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言，凯撒德国当时还缺乏另“一半”

“物质条件”，即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条件”——“无产阶级国家”。^②列宁教导说：即使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③那么，究竟如何才能使德国无产阶级在当时占到国内的统治地位呢？列宁的回答是：这只能通过“用……另一种社会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这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要实现这一点，又必须“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进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④

正是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列宁才毫不含糊地认为，象战时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⑤同时，列宁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环境下，在革命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⑥问题看来是再清楚不过了，列宁的这些思想可以

归结到一点，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而可行的道路，否则就只会是十足的空想或欺骗！

以上十点，我们认为就是列宁对凯撒德国战时经济中的重要变化和新现象的基本分析与结论。同我们在前面两节中论述过的德国战争经济的实况比较起来，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列宁的这些分析和结论，不仅是从当时德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并完全符合这种历史实际的，而且还是战时德国历史实际本质的最深刻的揭示，是这一历史实际的高度科学概括。

毫无疑问，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其整个帝国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后者的新的重要发展。同样地，列宁关于凯撒德国战争经济制度的全部观点，即对第一次大战时期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它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它的社会及阶级实质，它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以及它的历史地位等等的科学分析，也就是说，列宁关于凯撒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论断，也正是他对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制度整个科学结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新的理论贡献。

(五)

同列宁相反，第二国际的德国修正主义分子谢德曼、连奇、干尼希之流，对战争时期的德国经济制度，却完全持有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归结起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论点如下：

第一，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认为：凯撒德国的战时经济组织，它的一切活动，是有益于所有德国人的，即对各个阶级——剥削、统治阶级和被剥削被统治阶级——不分轩輊，

一视同仁。例如，保罗·连奇就写过：在战时德国建立的经济组织，正是“为了整体利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24—325页。

③ 同上。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页；第29卷，第98页；第32卷，第32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0页。

⑥ 《列宁全集》第26卷，第150页。

益的组织”！①

第二，他们还认为，战时德国经济组织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组织，德国政府所采取的调节及干预战时经济生活的各种措施，都是同资本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更明白了当地说，它们都是为了限制、打击甚至消除资本主义的活动和因素的。

例如，同一个连奇，在同一本书中，即曾滔滔不绝地宣称道：德国“政府本身不得不用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规定最高价格、尽力调整生产和消费的办法，来中止资本主义势力的自由玩弄”。接着，他还强调说：战时德国的经济组织，正就是“针对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而确立的经济生活的组织”。②

第三，他们认为，德国帝国主义政府、即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正是上述反对资本主义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易言之，这个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恰好是在当时德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德国修正主义分子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已在上面的引文中不打自招了；假如考虑到他们以下的观点，那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第四，他们进一步公然认为：德国国家战时实行的经济调节，按其社会经济性质说来，不仅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活动，而且还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例如，康拉德·干尼希公开叫嚷道：凯撒德国政府战时推行的调节措施，如食物凭证配售制度、对原料分配的各种限制等等，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路标”。③

第五，因此，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最后得出了结论：凯撒德国的战时经济组织，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组织；“社会主义”的因素，正在德国迅速成长；帝国主义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也业已是“社会主义制度”了。如连奇即曾煞有介事地问过：象上面所谈到的德国战时经济组织，“在原则上不是该叫做社会主义吗”？④同连奇相呼应，干尼希

干脆肯定宣称：凯撒德国的战争经济，“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发展”。⑤而在同时，这些家伙更尾随着他们的首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大头目菲力普·谢德曼一齐鼓噪不休，并大声叫嚷道：帝国主义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已是不折不扣的“军事社会主义”了。⑥

“军事社会主义”，这就是德国的老修正主义分子谢德曼、连奇之流对凯撒德国战争经济制度的观点和结论。

谢德曼之流的“军事社会主义”谬论，显然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时投降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在这里，谢德曼分子企图用美化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制度的间接手法，来混淆和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掠夺性质；企图用给德国政府戴上“为整体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组织”桂冠的伎俩，来遮盖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的反动阶级本质；企图用宣布德国战争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花招，来证明“和平进化”或“长入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正确，并从而一笔勾销德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伟大任务和事业。

可是，尽管谢德曼之流诡计多端，把“军事社会主义”讲得天花乱坠，当时德国的实际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在战时的凯撒德国，仍然只存在着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① 保罗·连奇：《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世界大战》。重点是引者加的。

② 同上。

③ 康拉德·干尼希：《战争和社会民主主义》。重点是引者加的。

④ 保罗·连奇：《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世界大战》。重点是引者加的。

⑤ 康拉德·干尼希：《战争和社会民主主义》。重点是引者加的。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页。

即对于富豪说来是天堂、而对于穷人说来是地獄的反动社会制度。在这里是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

列宁说得好：“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謝德曼、连奇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①列宁的结论是再明白不过了，德国的历史实际的确确是这样。

可见，喋喋不休地叫喊“军事社会主义”的謝德曼分子，其实不过是故意混淆真伪，颠倒黑白，是在睁着眼睛撒谎而已！

狐狸的尾巴终归是藏不了的。“军事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整个修正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第二国际及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一种“理论”花招；“军事社会主义”，这是替容克资产阶级军事帝国主义进行露骨辩护的谬论，是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块破烂的机会主义遮羞布；

“军事社会主义”，这是謝德曼之流献给凯撒德国统治阶级的一篇无耻的颂词，也是他们企图用来麻醉德国劳动人民革命意识的有毒的鸦片！

其实，“军事社会主义”也并不是什么新的货色。大家知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伯恩斯坦就在进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教，考茨基也已狡猾地把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军事社会主义”也者，只是这些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理论家”谬论的变相重复和宣扬。假如更进一步挖掘根源，那么，所谓“军事社会主义”，不过是从罗培托斯到桑巴特的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的翻版，并给它披上了“军事”的时裳罢了。

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样，我们将能更深刻地认识“军事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时当权派的謝德曼分子，他们到底干了那些活动呢？我们在下面只列举一些最重要的事实：

——当德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决定发动和实际进行掠夺战争的时候，謝德曼之流就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帝国议会中投票赞成侵略性的国家军事预算，并公然同统治阶级一道摇起了所谓“保卫祖国”的白旗，来帮助统治阶级欺騙德国人民，帮助容克资产阶级把德国劳动者硬綁上侵略的战車。

——为了加强德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的力量，为了保卫德国统治阶级的既得掠夺利益，謝德曼分子在战时还展开了多方面的帮凶活动。例如：他们“接受”德国政府的“委托”，公然跑到一系列中立国家，去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社会舆论贊助帝国主义德国；他们用向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祝福”和直接到前线“慰劳”等方式，为德国侵略军“鼓舞士气”；他们还在战争进程显然不利于帝国主义德国的时候，通过其丹麦同伙鼓吹締结“放棄部分兼併土地的和约”，从外交上协助德国帝国主义政府，以图实现同协约国集团的討价还价，从而用暗地分贓的办法结束战争，来保卫德国统治阶级的主要掠夺利益，等等。

——从保证德国统治阶级顺利进行掠夺战争出发，謝德曼及其同伙还积极协同凯撒政府迫害劳动者和鎮压一切革命活动，千方百计为容克资产阶级解除后顾之忧。例如，在大战开始后，謝德曼分子立即通过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宣布“国内和平”，即公开地推行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投降主义路线。不仅如此，在整个战争时期，謝德曼分子还利用自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頁。

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当权地位，一方面尽力阻止工人举行罢工、示威及从事其他反战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每当革命工人违反他们的意愿掀起了罢工等斗争的时候，他们又使出了各种诡计破坏工人的斗争。如在1918年1月，当全德军火工人掀起政治总罢工时，谢德曼等人就急忙钻进罢工领导机构，瓦解了这次著名的罢工斗争。

——在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时，谢德曼之流的叛卖活动更达到了无耻的顶点。1918年10月，谢德曼及其同伙公开参加了马克斯·卫丁内閣，他们想以自己的“社会主义者”的招牌，来掩蔽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阻止革命风暴的来临和挽救垂危的专制制度。当这一阴谋由于11月革命的爆发而遭到破产后，谢德曼分子又要出了新花招，他们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头子，全力帮助垄断资产阶级篡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看家狗。不但这样，在11月革命前后，谢德曼分子还穷凶极恶地参与了迫害、屠杀革命者的活动。例如，革命以前，他们即支持过德国政府囚禁李卜克内西等革命战士的反动行为；随着资产阶级的威玛共和国的建立，执政的谢德曼政府完全暴露了自己作为垄断资本工具的可耻原形，它在短短的时期中，不仅用屠刀杀害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而且还使德国成千上万的革命工人的鲜血，洒遍了柏林的街头！

——在国际上，谢德曼分子也同样是革命工人的死敌。他们曾经疯狂地反对列宁、反对各国的列宁主义政党和新生的第三国际，反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例如，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他们早就以反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而恶名昭著；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谢德曼之流不仅恶毒地咒骂、诋毁和攻击苏维埃无产阶级专

政制度，而且还在行动上支持德帝国主义以掠夺苏俄为目的的布列斯特和约政策，并无所不用其极地参加暗害、破坏直至颠覆苏维埃俄国的各种活动。

上列的种种事实说明：谢德曼分子的罪行真是铁证如山，擢髮难数！尽管当时这帮傢伙还恬不知耻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是，正如列宁所痛斥的，从战争开始起，谢德曼之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同德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结成同盟而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变成了无产阶级“卑鄙的叛徒”和“阶级敌人”，变成了“德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狗”和“卫兵”。^①也就是说，经过战争及革命的无情考验，谢德曼及其喽囉已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小群十足的恶棍和卖身投靠资本家的最卑鄙的混蛋，是……替君主制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效劳的最可恶的刽子手”。^②

这群十恶不赦的坏蛋，也恰好是他们，却正是“军事社会主义”的宣扬者！事情的内幕不是更加清楚了吗？这种“军事社会主义”论调，除了替凯撒德国的军事帝国主义制度涂脂抹粉，从而帮助容克资产阶级隐瞒这个制度的反动实质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内容呢？决不能有其它的了！可见，谢德曼这帮叛徒提出“军事社会主义”谬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除了欺骗人民，还是欺骗人民！

不过，谢德曼之流处心积虑地把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即他们终于不得不挂起“社会主义”之羊头，以偷售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6、353页；第24卷，第54页；第28卷，第407—409页；第30卷，第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页。

其修正主义之狗肉的事实，除了说明这群叛徒的异常阴险和狡诈以外，无疑地还从反面说明了后述情况：当时帝国主义德国已经是多么接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在德国又已经是多么深入到了劳动大众的心中！

在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回忆列宁的教导。列宁说：“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者）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

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①“军事社会主义”正是属于这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的言论”，是政治上危害甚大的一种修正主义“理论”捏造。因此，不仅当时的德国及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不能容忍它；而且，即使事隔多年，我们认为在今天仍有必要重翻旧账，并按照列宁的指示，再一次给予这种谬论以尖锐的揭发和批判。

（六）

在上面，我们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经济制度，也分别论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即列宁的观点和第二国际德国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可是，综上所述，我们究竟应该得出那些结论呢？

首先，我们认为，战时德国的全部历史实际证明：在所争论的问题上，唯一正确的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而绝对不是谢德曼之流的德国老修正主义分子；凯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是道道地地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完全不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什么“军事社会主义”制度。

其次，我们认为，列宁关于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和结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们是切合德国历史实际的、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理论、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直接继续和新的发展。与此相反，第二国际德国修正主义者谢德曼之流的“军事社会主义”观点之所以错误和反动，是因为这种观点完全违反凯撒德国的历史实际和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实质上是从桑巴特到考茨基的资产阶级谬论的又一次翻版。

再次，我们认为，列宁关于军事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充满了原则的、革命的、战斗的精神的理论，它是揭露和批判凯撒德国反动战争经济制度的强有力的武器。与此相反，第二国际德国修正主义的“军事社会主义”谬论，却散发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叛徒的、投降论的臭气，它不过是粉饰和辩护容克资产阶级军事帝国主义制度的可耻言论。

再次，我们认为，列宁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不仅适合于分析凯撒德国的战时经济制度，而且还无疑具有远为普遍和远为长期的意义。这一理论是完全经受住了并能继续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科学理论，只要帝国主义制度及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存在一天，列宁的理论就会得到新的更多的证实，从而不断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战斗的光辉。相反地，第二国际德国修正主义者的“军事社会主义”神话，不过是曇花一现的机会主义谬语，它是根本经不起时间和事实的考验的。实际上，这种谎言连同其宣扬者谢德曼之流，都早已一道被德国及其他国家革命人民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30页。

最后，我们认为，列宁和謝德曼分子的爭论，虽然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实；但是，这场原则爭论的意义，不仅沒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減弱，反而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变得日益鮮明起来了。因为，包括直到今天的全部现代历史表明：几十年以来，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全世界的迅速推进和帝国主义制度的日趋沒落，一方面，包括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内的列宁的革命理论，日复一日地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日益深入到各国更加广大的革命群众的心中；另一方面，帮助本国垄断资本作垂死掙扎的各国一辈又一辈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却步上謝德曼分子的后尘，采取了各种新的花样和手法，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把

腐朽透頂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冒充为社会主义，从而妄图再度欺騙各国劳动人民。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更有必要高举列宁的革命理论的红旗，再次温习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以便更好地掌握列宁的革命理论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彻底粉碎当前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而达到不断揭露现代帝国主义制度反动本质的战斗目的。

上述各点，就是我们结合凱撤德国战时经济制度问题，重新学习列宁关于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并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对德国老修正主义分子的謠言进行批判所得出的基本体会。